

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

徐 珺 霍跃红

(大连外国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02)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策略和方法, 提出在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时, 应该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 采用异化的策略, 适度运用中国英语, 从而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 真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一员。

关键词: 典籍英译; 文化翻译观; 异化; 中国英语; 中国式英语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guiding principle, the proper strategy and the approach availabl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t is held by the authors that Chinese classics should be translated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by way of foreignization into China English, but not Chinese English.

Key Wor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cultural perspectives; foreignizing strategy; China English; Chinese English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08)07-0045-04

1 引言

典籍翻译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国际间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这已是当今国内外翻译界所达成的一个共识。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已无需赘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有关文化多元性的宣言中就提到“人类的文化多元性犹如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必要”(http://www.tac-online.org.cn/lshhy/tac-ls-19.htm20050719)。2004年, 国际翻译家联盟将当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选定为: “翻译, 多语并存和文化多元性的基石”(http://www.tac-online.org.cn/lshhy/tac-ls-19.htm20050719)。这一主题旨在强调对外开放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并指出翻译在其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 每一个民族不仅要包容和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 更要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换言之, 在21世纪的今天, 在全球化语境下, 我们要保持我们汉文化的特性, 就必须紧紧依靠我们自己的语言——汉语, 必须紧紧抓住我们的根和文化。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那就意味着消亡。“而中华民族要使自己的民族精神得以保持和发扬,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除了要加强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外, 还应该重视对外宣传, 加强对外翻译。”(林本椿, 1999)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 典籍“泛指古今图书。中文古典典籍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 人们对社会和自然作精心思考的精髓。……现在‘典籍’一词主要是指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 被人们所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作。”(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0307)把凝结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典籍翻译成国际通用语言的英语, 无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的途径, 尽管这不是唯一的途径。

有关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 汪榕培(1995)、卓振英(2002)和潘文国(2004)等译界前辈都有过精辟论述。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代表作品丛书目录》(转自潘文国, 2004)可以看出, 选入该丛书的

我国名著被译成英语的只有28种。中国文化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 历史典籍浩如烟海, 可为什么入选的作品如此之少? 由此可见, 我国在对外翻译和对外宣传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实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加强典籍翻译、弘扬中国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翻译界对为什么要翻译典籍已经达成共识之后, 产生争议较多的则是怎样来译的问题, 即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问题。有人坚守“信、达、雅”的标准, 坚持“传神”和“化境”; 也有人主张保持民族特色, 采用异化的策略, 如孙致礼(2002)。笔者认为, 在进行典籍英译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文化翻译观或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 采用异化的策略, 适度采用“中国英语”, 而不是“中国式英语”来翻译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

2 文化翻译观

我们知道, 语言是人类用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世界上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民所使用的多种语言之间有着广泛的共性。但是, 由于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不一样, 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就存在着很大差异。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 它浸透了民族的文化; 文化包含语言又影响语言。翻译的实质体现为: 在两种语言交流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它不是简单地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而是从一种文化中的语言表现形式转换成另一种文化中的语言表现形式。(参见徐珺, 2005, 2006)

据文献记载, “文化翻译”的概念最早是由社会人类学家提出的, 埃德蒙·里奇在《我们自己与他者》一文中对这一概念加以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参见刘禾, 2002)。所谓文化翻译, 指的是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 即对各民族间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和个性进行研究, 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换言之, 文化翻译观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翻译。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兴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 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

作者简介: 徐珺, 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学, 应用语言学, 语篇分析, 外语教学; 霍跃红, 副教授, 博士生,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外语教学

收稿日期: 2008-04-23(修改稿)

切入翻译问题。Holz Mantari (1984)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指翻译;Lefevere (1992)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Snell Homby明确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并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单位,把文化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中来(参见 Genzler 1993)。这就标志着文化翻译观的基本形成。

文化翻译观的主要内容是:“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杨仕章, 2000: 4)换言之,原作和译作都是文化产物。

文化翻译观既考虑历史、社会背景,又注重那些有同有异,大同小异,同中有异的词语。译者应保持清晰的思维,既要注重文化深层的蕴含,又要了解语言表层含义的异同之处。例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羊”是个褒义词,如“领头羊”。而英国人却视“goat”(汉译:“羊”)为“色鬼,淫荡的人”。中国人十分喜爱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常有亲昵的成份,但在西方文化中“cat”猫”被用来形容“包藏祸心的女人”。再如中国成语“知子莫如父”与英语成语“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形式非常相近,实则涵义相反。汉语“知子莫如父”,强调父亲最了解孩子;英语用“It is (a wise father) that...”这种句型来反衬或强调即使父亲也不一定了解自己的孩子。

3. 异化策略

既然翻译已不再被看作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作为文化转换的模式,那么在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时,就应该注意翻译策略的选择,即“归化”和“异化”的选择。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在从事典籍英译时,译者应采取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为目标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文化,实现文化信息的对等传递。这就要求译者在进行文化因素翻译时,尽可能地采用异化的策略。

翻译界对于“归化”和“异化”策略有过诸多论述。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 Schleiermacher 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autho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reader towards him);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the translator leaves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moves the author towards him)。”(Schuttleworth & Cowie 1997)美国翻译理论家 Venuti 进一步阐述了翻译策略。1995年他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了“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原文作者和源语文化为归宿,后者则以目的语、目的语读者和目的语文化为归宿。Venuti通过对17世纪和18世纪以来西方翻译实践的考察,提出“流畅的翻译掩盖了译者的主观阐释,将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斡旋过程隐于无形,译者的辛劳被作者的权威所掩盖,许多文化与语言差异也随之被掩盖。”(任淑坤, 2004)为此,他提出了抵抗式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这样就能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让译文读者感受到异域风情,感受到其他文化的存在与独特魅

力。(刘艳丽 杨自俭, 2002)

首先,异化策略的选择是文化对等观念的要求。“不同的文化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应该是平等的。平等就意味着尊重。这种尊重既有对源文化的尊重,也有对原作者艺术创造的尊重。仅从目标文化出发,置出发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至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出发文化,这是一种不尊重出发文化的行为,因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王东风, 1999)文化对等原则要求译者积极介绍源语文化,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整体文化氛围。中国典籍的突出特点是:“许多词句言简意丰,经受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了汉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涵义……”(李文革, 2000)。那么译者作为文化使者,应该尽量传递源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蕴。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翻译甚至可以被概括为“文化再现”(cultural reappearance)(白靖宇, 2000)。由此可见,异化策略是尊重外国文化的必然要求,它有助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异国文化,而且这也往往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其实,异化策略的被接受程度和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是成正比的。(陆莺, 2004)

其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异化策略也是文化渗透、文化交融的客观要求。文化学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是相对的、偶然的,而差异是绝对的、必然的。文化又是开放的,具有潜在的相互吸收和包容的能力。文化交融的结果就是文化之间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介绍出去(黄东琳, 2001, 转自晏小花 刘祥清, 2002)。我们应该看到,人类文化和思维的共性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成为可能,而文化的渗透性是文化交融的前提。目前人类处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但文化融合已使文化的共性日益突显。文化本身还具有极强的吸纳包容能力,这使外来的新鲜事物易于被人们所接受。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英语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势文化,是与英语民族广泛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分不开的。正如英国学者庞德(参见王佐良, 1984)所说的:“引为自豪的英国传统文学也是建立在翻译作品上的。每一次新的繁荣都是由翻译作品的激励而起。”我们都知道汉语中有许多词汇来自英语,其实英语中来自汉语的词语也非常之多。实际上,在英语标准辞书和其他印刷媒体的语料库中,至少有1189个词源于汉语,此外还要加上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缩略语NPC(参见曹亚民, 2000)。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不断发展,也正是得益于翻译中不断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髓。季羨林(1997)在《中国翻译词典》的序言里就中国文化与翻译关系的论述做过形象阐述:“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从未枯竭,原因是有水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东方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青葆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季羨林的这段话,对我们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与评价翻译的作用,无疑具有理论的指导意义。

翻译对文化的促进是积极的。与此同时,文化对翻译也产生影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1)促进翻译;(2)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翻译。人类发展史表明:文化具有渗透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使语言间的相互借鉴成为可能,并没有因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而造成隔绝。例如,汉语成语“望子成龙”一直被译为

“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one's childre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因为在西方传统文化中,dragon指的是“长有双翅、会喷火的怪兽”,是邪恶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神圣的,如“真龙天子”。但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与发展,西方人对汉语里“龙”的文化内涵逐渐熟悉、逐渐理解,并逐渐接受。“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 dragon”(望子成龙)也逐渐被认可和使用。

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最本质进展就是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目的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目的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目的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和纽带,在沟通文化交流,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趋同和融合的过程中正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同样离不开文化背景知识,因为“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赵元任,1968/1996)。“翻译活动始于语言,又终于语言;它以语言为形式,以文化为内容,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为目的。因此,语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包惠南 包昂,2000)

对异化翻译的需求也是人们求新求异心理的客观体现。“人们在社会文化系统和哲学思想系统上的求新求异心理是十分强烈的。而语言符号系统上的求新求异心理则是无止境的。”(刘英凯,1997)翻译作品要保留“外国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习俗时尚、宗教、地理、使用语言的习惯”(刘英凯,1997),而“归化的译文却要改造外国上述的客观事实,抹杀其民族特点,使它们就范,同化于归宿语言,因此也就必然是对原文的歪曲”(范东生,2000)。20世纪末,由南京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发起的关于《红与黑》几个译本意见的调查也表明,读者希望能够读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译本,以便能够领略到外国文学作品中特有的韵味和情调(参见许钧,1996)。了解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身份。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不必惟西方文化是从。在文化移植过程中,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这样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跨文化交际。

4. 中国英语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异化是典籍英译时我们应该采取的翻译策略。那么通过什么方法来具体体现或贯彻异化的策略呢?我们认为,在上述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典籍英译时应适当采用“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首先是由葛传槱(1980)提出来的。他在1980年《翻译通讯》上发表的名为《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不论在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所有这些英文译文都不是 Chinese English 或 Chinglish(中式英语),而是 China English。”从此,“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人们对“中国英语”的广泛讨论。汪榕培(1991)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并指出,“‘中国英语’是个客观存在,它既不会长他人志气、也不会灭自己威风。”李文中(1993)提出了“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借译及语意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

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随后,贾冠杰、向明友(1997)论述了中国英语的客观性,中国英语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此外,谢之君(1995)、晏小花(2002)、林琼(2001)等纷纷发表对“中国英语”的认识和看法。综合以上几家观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 中国英语的使用对象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人;

(2) 中国英语的基础是规范英语;

(3) 中国英语用以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东西,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在音位、词汇等层面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在我们进行典籍英译时,我们语言中的某些特有事物,某些句法特征、篇章结构特点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等都会在我们的译文中有鲜明的体现,因为“英语一旦和中国文化接轨,负载上中国文化的内容,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完全陌生化的文化语言现象。”(江晓红,2001)。这就是中国英语,它的实质就是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而一种语言中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是找不到完全对等的表达法的,否则就无所谓民族特色。所以在进行典籍英译时,我们要大胆使用中国英语,从而填补由于英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表达真空。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首先,中国英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增进外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如:茶文化、酒文化等,而中国英语的出现为准确定义中国特有的文化和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中国英语可以生动体现:(1)中国的地域特色,如:春风又绿江南岸, The east wind has greened South China;(2)汉语的时空特色,如用12属相来纪年等, the year of dragon(龙年);(3)社会结构的特征,如: yamen(衙门);(4)汉语的语用特色,如 Three Represents(三个代表);(5)汉文化深刻的人文内涵,如: Confucianism(儒家)、qigong(气功)等(金惠康,2002)。中国英语将会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国情有正确的理解,从而消除对中国的误解。

其次,中国英语有利于中西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统,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也截然不同,中国英语有利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发掘和探讨,从而有利于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再者,中国英语可以大大弥补典籍英译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中西文化内涵的不对应形成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导致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徐珺,2001)。在翻译这些文化空缺词时,可以采用音译、译借和语义再生的手段译成中国英语,如:功夫(kungfu)、叩头(kowtow)等,从而大大缓解译者的劳动和困难。

5. 结语

我们提倡在进行典籍翻译时采用异化的策略,运用中国英语,但对中国英语的运用要适度。我们要强调的是,中国英语并不等同于中国式英语。中国式英语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李文中,1993)故此,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的,具有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而中国式英语是“那种畸形的、混合的、既非英语又非汉语的语言文字。”(琼·

平卡姆 姜桂华, 2000)。我们认为文化翻译观是典籍英译时的指导原则, 异化翻译是其策略, 而中国英语是汉英文化翻译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 [1] Gen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2] Holm Mänttari J. Translatiorische Handelns Theorie und Methode[M].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1984.
- [3] Lefevere A.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M].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 [4] Schuttleworth &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 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er, 1997.
- [5]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6] 白靖宇. 文化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7] 包惠南 包昂编著. 实用文化翻译学 [M].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0.
- [8] 曹亚民. 英语中的汉语借词 [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4).
- [9] 范东生. 文化的不同层次与翻译标准 [J]. 外国语, 2000(3).
- [10] 葛传槱.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 [J]. 翻译通讯, 1980(2).
- [11] 季羡林. 中国翻译词典: 序 [J].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 [12] 贾冠杰 向明友. 为中国英语一辩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5).
- [13] 江晓红.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国英语 [J]. 外国语, 2001(2).
- [14] 金惠康. 汉英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 CHINA ENGLISH [J].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2(2).
- [15] 李文革. 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文化意蕴及其翻译问题 [J]. 外语研究, 2000(1).
- [16]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4).
- [17] 林本椿. 文化全球化和对外翻译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2).
- [18] 林 琮. 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新探 [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1).
- [19] 刘 禾. 宋伟杰等译. 跨语际实践——文学, 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1900—1937)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20] 刘艳丽 杨自俭. 也谈“归化”与“异化” [J]. 中国翻译, 2002(6).
- [21] 刘英凯. 试论奈达“读者反应”论在中国的负面作用 [J]. 上海科技翻译, 1997(1).
- [22] 陆 莺. 论异化翻译的最优化 [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2).
- [23] 潘文国.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 中国翻译, 2004(2).
- [24] 琮·平卡姆 姜桂华. 中式英语之鉴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25] 任淑坤. 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11).
- [26] 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 从归化趋向异化 [J]. 中国翻译, 2002(1).
- [27] 王东风. 文化缺损与翻译补偿 [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28]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1(1).
- [29] 汪榕培.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5(1).
- [30]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J]. 翻译通讯, 1984(1).
- [31] 谢之君. 中国英语: 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 [J]. 现代外语, 1995(4).
- [32] 徐 珺. 文化内涵词——翻译中信息传递的障碍及其对策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1).
- [33] 徐 珺. 古典小说英译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 [34] 徐 珺. 汉英语篇形合与意合之文化阐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12).
- [35] 许 钧.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 [C].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36] 晏小花. 中国英语与中国跨文化翻译 [J].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3).
- [37] 晏小花 刘祥清. 汉英翻译的文化空缺及其翻译对策 [J]. 中国科技翻译, 2002(1).
- [38] 杨仕章. 文化翻译观: 翻译诸悖论的统一 [J]. 外语学刊, 2000(4).
- [39] 赵元任. 丁邦新译. 中国话的文法 [M].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 [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68/1996.
- [40] 卓振英. 典籍英译: 问题与对策 [J]. 汕头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